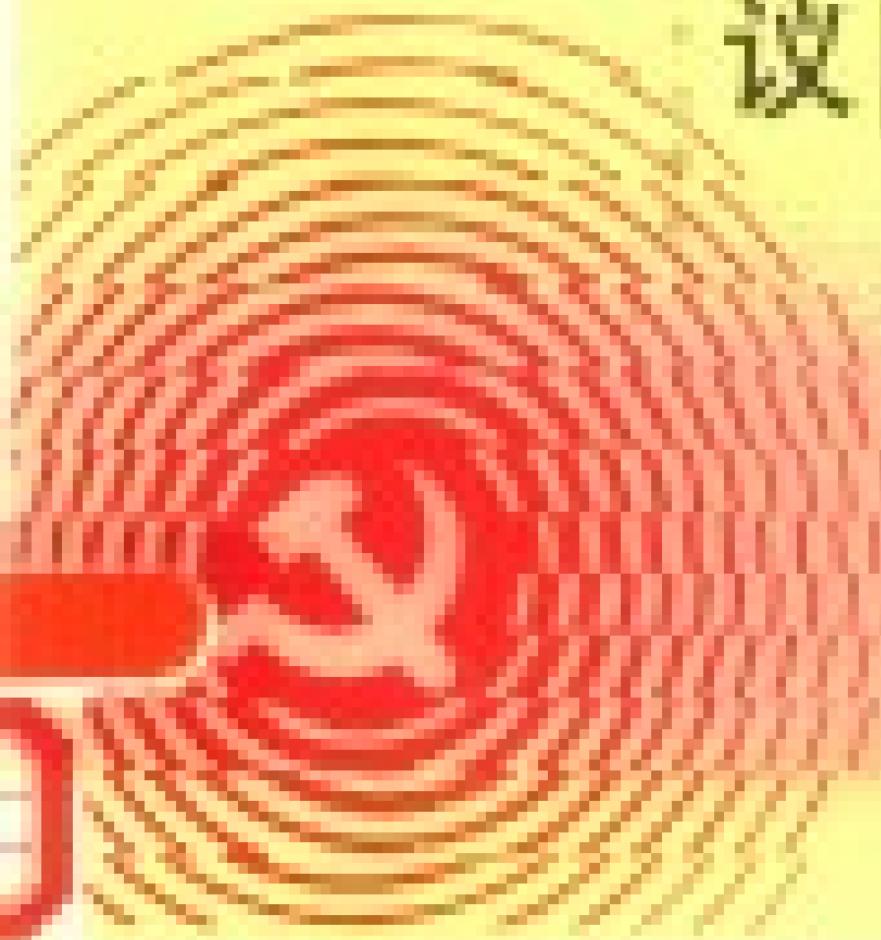


八十七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八七会议

刘汉东编写

新华出版社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编辑委员会

顾问：王首道 康克清

主编：苏双碧

副主编：陈君聪

编委：李捷 曹宏遂

周道荣 宋镇铃

马宝珠

责任编辑：张传秀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八七会议

刘汉东 编写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2,000字
1991年5月第一版 1991年5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 7—5011—0972—9/K·131 定价：0.75元

中国革命史小丛书

八七会议

刘汉东 编写

目 录

| | |
|--------------------|------|
| 一、疯狂的反革命逆流..... | (1) |
| 二、右倾投降主义“软骨病”..... | (9) |
| 三、共产国际指示与中共..... | (14) |
| 四、一次力挽狂澜的会议..... | (20) |
| 五、历史性的决议..... | (26) |
| 六、巨大的功绩和历史局限..... | (31) |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展现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场景。但在大革命的航程前面，正隐伏着一块巨大的暗礁。

一、疯狂的反革命逆流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广东革命根据地具备了出师北伐的实力，1926年5月20日，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挺进湖南作为先锋，拉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6月5日国民政府颁布北伐动员令，7月9日正式出师北上。由于国共合作、苏联无私援助和共产党员的骨干作用，北伐军节节胜利，势如破竹，至1927年3月，以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为标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革命在胜利，反革命却在暗中窥视，阴谋篡夺胜利果实，阴谋消灭革命胜利的功臣——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工人、农民、士兵群众。国民党中的反动派虎视眈眈，蠢蠢欲动，随时准备下手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其中，长期伪装为革命左派、孙中山先生忠心耿耿的学生、中山遗训和三民主义继承人的蒋介石，更是积极准备，寻找时机。

蒋介石历来对中国共产党和大革命有刻骨仇恨，早在1926年3月就制造了一个反共反革命的阴谋事件——中山舰事件，攻击共产党“阴谋暴动”以推翻国民政府，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随即，他又扣留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全体共产党员，强迫全部退出第一军，完全控制了该军领导权。5月15日蒋介石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借口

“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提出“整理党务案”，规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省党部、特别市党部的执委名额中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和中共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应先经国共两党联合讨论后，始可发出。对于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活动如此限制的提案，陈独秀在一味退让的右倾机会主义指导下，竟然接受了，因而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

北伐战争的胜利，使蒋介石觉得自己羽毛丰满了。他的第一步棋是在迁都问题上做文章。

由于革命军的北伐胜利，长江流域中下游诸省已为国民政府所掌握，从广州发布指令就使人颇有鞭长莫及的感觉，因此就议定迁都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蒋介石对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上武汉三镇，不仅没有反对，还表示支持和帮助。但是，1926年12月7日第一批在粤人员北迁之后，蒋介石却又变卦了。当第二批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府委员行至南昌时，竟被蒋介石扣留，要求迁都南昌。其实南昌并不具备成为首都的条件，只因武汉地区大革命热火朝天，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也蓬勃发展，被当时人们视为赤色世界，所以蒋介石要反对迁都。他这一行径，无疑是对他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示威，乃是无理主张，当然遭到了拒绝。次年1月，蒋介石又亲自出马，从南昌赴武汉，重弹改都之调，仍未得逞。迁都之争以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胜利结束，成立了武汉国民政府，并在3月7日至17日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

作出决定，给蒋介石以纪律制裁和限制。防止他搞军事独裁。可是，他已经通过国民党新右派控制了军权。于是他有恃无恐，变本加利，加速了阴谋活动。

帝国主义列强在国民政府战胜北洋军阀之前，是支持北洋军阀，反对国民革命的，甚至以炮舰轰击万县，制造惨案。它还轰击南京，造成2000多军民死伤的惨案，以阻止北伐。到北伐已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则积极在国民党中寻找代理人，以保护帝国主义在华权益。他们的目光盯在了国民党新右派领袖蒋介石身上，认为只有他才是坚持保护帝国主义利益的主张、维持秩序的“温和派”，才能够保证长江以南区域不被共产党人控制的力量。于是，各种说客在蒋介石总司令部大门川流不息，熙熙攘攘，洽谈反革命交易。买办头目虞洽卿也答应蒋介石借给一笔巨款，只要他反共灭共，就拿出6000万银元来给他。

善于不失时机玩弄权术，扩展私人力量的蒋介石，在北伐的整个过程中都在收编军队，委任亲信，使之所控制的军队日多，权力日大。同时，又不断玩弄两面派手法，打击与中国共产党有关的社团，煽动反共气势。他从广东入江西，经安徽，进上海，一路之上还留下了一连串屠杀共产党人和农工的惨案：捣毁赣州总工会，枪杀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相继制造吉安、于都、抚州、上饶、永修、丰城等10余县的惨案；强行解散南昌党部和省学联；封闭左派报纸《贯彻日报》；捣毁九江市党部和总工会，打死打伤多人；捣毁安庆市党部、安徽省党部、省总工会和省农会筹备处

等，打伤多人。蒋介石以“辉煌”的反共“成果”，于3月26日进入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和买办资产阶级势力的大本营，即蒋介石早年混迹于此的上海。

蒋介石屁股尚未坐暖，即秘密与帝国主义特务、流氓头目、官僚买办、反动政客、新旧军阀代表来回磋商，阴谋发动一场镇压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反革命政变。上海外围首先在其指令下动手，何应钦到南京将三个倾向革命的团缴械，解散共产党组织和国民党省、市两党部；袭击杭州市总工会，公开屠杀工人群众和工会领导人；勾结孙传芳旧部，收编为两个军扼守上海外围要道。此后，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更为频繁：4月1日与两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吉应芬等密商。2日，由右派吴稚晖、张静江等出面召开所谓的中央监察会议，发出“弹劾共产党”文告。3日，与汪精卫等国民党要人秘密会议，决定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所谓的国共“党事纠纷”。5日，调出受革命影响的上海驻军，另调旧军阀改编的26军入沪。6日，以总司令部名义发表通告，一切武装纠察队和工会听命于总司令部。8日成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9日公布战时戒严条例。然后，蒋介石留下杨虎具体负责，自己到南京，于11日颁布密令，“已克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

反革命大屠杀的号令一下，上海反动派立即举起了手中的屠刀，朝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砍去。4月12日拂晓，还有早春寒意的上海滩各街头，突然涌出一批批一队队流氓打手青红帮分子伪装的“工人纠察队”，全副武装，围打闹

北、沪西、南市各处工人纠察队。早已布置好的反动军队在真假工人纠察队接触后，突然出现，声称保护工人，调解工人纠察队内讧，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员的武器，并参与屠杀工人，当场死亡120人，重伤180人，枪械大部被缴。

蒋介石反动面目的暴露和反革命暴行的发生，使得革命工人群众愤慨之极，上海总工会当即下令总同盟罢工，各区举行规模巨大的抗议集会，并从反动军队和流氓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上海工人确有革命传统，决不低头！

13日，近20万工人罢工，有6万余人参加了闸北青云路举行的总工会大会，会后冒雨游行示威，当到达宝山路26军2师司令部前不远处时，反动军队突然四出，向无辜的革命群众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100多徒手群众在枪声中倒地，受伤者不计其数，死伤群众的鲜血与雨水相混，象条血河在宝山路街面上流淌，人人望之掩目心酸。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由蒋介石一手造成了，正在生机勃勃中的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灾难和考验。死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估计达5000人，许多优秀的共产党活动家和领导同志，如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在这次大屠杀中英勇献身。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对派和极右派的上海政变，是一个大屠杀的总信号，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占统治地位的地方，都发生了名曰“清党”，实则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惨剧，南京、宁波、无锡、杭州、厦门、福州等地，无一幸免。白色恐怖笼罩在一度革命人民欢心鼓舞、扬眉吐气的

华夏大地，流氓、无赖、地痞、阿飞到处张牙舞爪，招摇过市。

蒋介石在上海放手杀人，古应芬、钱大钧、李济深等人遥相呼应，立即在革命大后方广州也大开杀戒。他们煞有介事地成立了五人特别委员会，任命蒋介石的嫡系心腹钱大钧为戒严司令，于4月15日发动了可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列的“四一五”广州大屠杀，首先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搜查和封闭了各有关革命组织机关和社团，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随意杀害，罹难者达2000余人，著名的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邓培、李启汉等在这次事变中牺牲。

北方军阀也不甘心于在反共屠杀中落后，奉系军阀张作霖此时正统治着北京，也悍然出动大批反动军警，甚至不顾国际舆论的谴责，强行进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及其附属机构，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及其他共产党员60余人带走，于4月28日将李大钊、范鸿劼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邓文辉、路友于等20余人处以绞刑。

在一片血风腥雨和反共反革命的叫嚣中，蒋介石开始建立他后来得以统治中国20余年的蒋家王朝，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大官僚和帝国主义效力。革命中心武汉在得知上海、广州、北京等地的大屠杀之后，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强烈要求下，4月17日武汉方面公开斥责蒋介石的暴行，开除蒋介石党籍，各社会团体和革命组织也纷纷通电声讨蒋介石的罪行，宁汉分立开始了。在当时的中国，共有三个政权：武汉、南京、北京，在人们心

目中只有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才是革命政府，中国共产党中的不少人也如此认为。对蒋介石反革命罪行的山呼海啸般的愤怒责骂，淹没了蒋汪四月“清党”密约。

距上海大屠杀不过35天，武汉政府内的反动派来不及等待汪精卫集团的表示，就迫不及待地追随蒋介石反共反革命了。5月5日，武汉政府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策动和15军军长刘佐龙、四川军阀杨森的支持下准备叛变，6日移动部队，13日发出通电叛汉归宁，坚决反共，由宜昌攻袭武汉。叶挺率本部官兵与武汉工人纠察队、中央农讲所学员和武汉军事政治学院学兵合作，奋勇作战，将之击败，但因汪精卫下令不得追击而让其得以窜逃鄂东南地区行凶作恶，大肆屠杀农工和共产党人。

夏斗寅的叛变波及长沙。35军军长何键早就心怀不轨，既仇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又想趁乱挤走唐生智，独霸湖南省，做湖南王。他收买长沙驻军33团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发动了叛变，因该日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故称“马日事变”。事变后许克祥查封了所有的革命机关和团体，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干部，公开叫嚷“打倒共产党”，土豪劣绅无不举手加额，拍手称快，反革命白色恐怖更盛。许克祥叛变后，四方农军集结号称10万，欲攻城平叛，却被陈独秀等所阻止，以致许克祥及一批反动军官、国民党右派肆无忌惮地放手杀人，在全省“靖乡”。至6月中下旬，长沙等县市被杀害1万余人。

夏、许之叛，又引出了江西省省长兼第3军军长朱培德

叛变，于5月27日起查封革命团体和报刊，强迫共产党员脱离政府与军队，大唱“礼送”共产党人出省境的好听话，背后却指示屠杀、活埋共产党员、工农干部和群众。一时间，国民党宁汉两政府及北京军阀政权所统治的区域都陷入法西斯式的黑暗之中。唯有武汉国民政府和汪精卫尚未彻底暴露其反共反革命的嘴脸。

汪精卫一生，最善伪装变色，又最为阴险狡黠，也最无良心人性。此时此刻其他人都在以反共反革命来讨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土豪劣绅，汪精卫不是不愿如此，只不过他还想在宁汉对立上胜过宁方，所以暂时隐忍不发。而在背地里，汪精卫集团却在加速政变步伐，确定“分共”。在他看来，反共反革命在当时中国已掀起浪潮，正好由他来主持清党分共，使之达到高潮，再次出一出领袖风头。

6月5日汪精卫解聘苏联顾问，10日参加策划反共的郑州秘密会议，19日徐州会议蒋介石与冯玉祥合作，从而促使宁汉合流。7月14日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反革命叛变计划。15日，汪精卫公开背叛，宣布分共，并公然叫嚣“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开始了大屠杀。“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残暴程度与前面几次大屠杀决无逊色，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死在汪精卫反动集团的屠刀下。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疯狂的反革命逆流所淹没。无数英勇的革命先烈在刑场上慷慨赴死，壮烈牺牲，哀挽之音缭绕于人们沉重的心头：大革命为什么会失败？革命还有希望吗？国家民族还有前途吗？

二、右倾投降主义“软骨病”

八七会议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背景，除了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国民党反动派相互勾结，反动力量比中国共产党强大，所以一旦形成了反革命逆流就使大革命遭到失败之外，还有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使党患了“软骨病”，不敢斗争，不敢反抗，不敢胜利，坐等别人把屠刀架在自己的脖子上，从而使革命失败。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的主要原因。

早在“中山舰事件”时，毛泽东等同志就主张依靠工农，团结国民党左派，给新右派蒋介石以坚决的反击，并且提出不排斥以武力对武力的主张，以维护中国共产党来之不易的革命领导权。此时蒋介石的力量并不强大，国民党左派明显比右派占上风，坚决回击，一定能沉重打击反动派的反共反革命的嚣张气焰。陈独秀却认为，共产分子在国民党一切工作中都不应太负责任，不应喧宾夺主、与国民党争一日之短长，应该退让，以免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影响国共关系。因此，毛泽东等人的正确主张不能实施，退让的结果使蒋介石达到了控制第一军的罪恶目的。

接着，陈独秀又在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问题上再次作出重大退让。这是蒋介石抢夺领导权、打击共产党的一个阴谋，毛泽东等坚决反对，连国民党左派人士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人也识破了这个阴谋，反对通过提案。陈

独秀却妥协投降，认为此举既可消除共产党“包办”国民党之嫌，又“有利于”国共合作，指示参加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共产党员接受“整理党务案”，还加派彭述之、张国焘指导二中全会中共党团，强迫签字同意，使决议案获得通过。事后陈独秀觉得投降妥协不彻底，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函国民党中央，声称国民党内部问题，无论作出如何决定，他党包括共产党均无权干预。更加令人愤慨的是他竟然以个人名义在《向导》周报上公开发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替蒋涂脂抹粉，说他从建立黄埔军校直到3月20日（即三二〇事件当天），从未做过一件反革命的行为，谁反对蒋介石就是“反革命”，请蒋介石去枪毙掉。结果，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被解职，不少右派当上了部长。

在北伐战争过程中，蒋介石逐渐暴露出真面孔，可是当苏联顾问加伦提出请中国共产党确定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还是削弱蒋介石时，陈独秀却漠然置之，致使蒋介石得以做好反革命准备，积蓄私人力量，为蒋家王朝的建立打下基础。陈独秀还对汪精卫长期抱有幻想，以为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中心、政治的中心，希望以汪派势力抑制蒋派势力。因此，局势越是严峻，陈独秀所得出的错误看法就越多，右倾投降主义就越严重。陈独秀认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行动过火了，太“左”了，与国民党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磨擦中退让太少，妥协不够，所以刺激了国民党右派和各军事上层人物。若要改变这一状况，就要反对内部的和工农运动中

的过分做法，批判“左倾”，实际上是放弃革命领导权，任由国民党牵着鼻子走。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小集团的错误主张，曾先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瞿秋白等人的批评和抵制，他们并撰写文章加以驳斥。特别是毛泽东，通过对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的考察，即写出了影响极大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主张全力解决土地问题，并把它提到了国民革命是否能够胜利完成的高度。可是国民政府反对解决土地问题，陈独秀也随声附和，顽固坚持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进一步向国民党反动派妥协。正如八七会议上所作的《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中所指出的：“在第五次大会时，土地问题议决案虽然通过了，但是党的领袖陈独秀、谭平山同志，却说现在只要扩大而暂时不能深入革命，所以没收土地还要等一等”。并且以谭平山为首的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会议时，也是一味顺从国民党的主张，不解决土地问题。

陈独秀、彭述之等人的投降主义从“四一二”上海大屠杀至“七一五”武汉叛变期间，发展到了顶峰。

蒋介石叛变革命，使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处在紧急关头，这时要挽救革命，首要的就是要打倒蒋介石，肃清叛徒，消灭反动势力。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人如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李立三等人提出东征讨蒋。毛泽东等以全国农民协会名义发出了《讨蒋通电》，又与董必武、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联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联名通电痛斥蒋介石的叛卖

罪行。如此一来，党内就出现了三种观点：东征讨蒋；南征讨伐李济深；北伐张作霖，最后确定支持武汉国民政府北伐。

这期间，由4月27日至5月9日，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陈独秀代表党中央所作的长达5个小时的政治报告中，连篇累牍都是为其右倾投降主义辩解，坚持认为“中山舰事件”应该退让妥协、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是错误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未到时候等等。他甚至提到了“向西北去”的逃跑方案，想躲开东南地区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强大势力，表达其低沉的失败主义情绪。陈独秀的投降主义、逃跑主义、失败主义受到与会代表中许多人的尖锐批评。经过数天的争论和斗争，大会作出决议，否定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出了这一错误对党的建设发展和革命事业的巨大危害。大会也批判了逃跑主义和恐惧失败情绪，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但是，当时陈独秀实行“家长”制，党内同志又都比他年轻，资格没有他老，不少人还是他的学生，加上对右倾投降主义的危害性估计不足，警惕性不高，依旧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选入31人中央委员会，陈独秀继续担任党中央总书记。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了，但是危机并没有结束，右倾投降主义依然统治着党中央，使其在后来受到更大的损失。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不能有效地阻止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发展，武汉政府辖区内反动势力就有了可趁之机，

活动猖狂，最后造成了反动军官夏斗寅、许克祥等叛变。局势恶化，危机四伏，情况紧急，如何抉择，其结果天壤之别。蔡和森主张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由叶挺部联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兵立即占领粤汉路，围剿夏斗寅部叛军。他还在5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北伐、东征、南征的问题都很遥远，现实是两湖反革命大暴动。为此起草了有关两湖问题的决议案，破除对国民政府的迷信，坚决地干自己的事情，以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决议案中还提到发展、扩大革命工农武装，反抗斗争，最后消灭反动势力。毛泽东也主张拿起武器，到农区去，到崇山峻岭浩渺湖荡中去，坚决斗争到底，斗争到胜利。周恩来在给中央的信中，也坚决反对妥协，否则势必铸成大错。

如此紧急的局势，陈独秀却依然故我。汪精卫4月初曾通知陈独秀，禁止各地共产党随意活动，禁止工农运动。4月5日，他们发布《汪陈联合宣言》，麻痹了革命人民。夏、许叛变之后，陈独秀等人竟下令停止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放下武器。

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后，由长沙、湘潭、湘乡、浏阳等县农民协会组织了一支规模巨大的农军，人数达10万，集结于长沙城周，准备5月下旬攻城。此时长沙城内叛军不过数千，在强大的农军面前简直难挡一击。但是中共中央却下达训令，严禁攻城，以免政局发生纠纷，应等国民政府和平公正解决事端，防止“贫农幼稚行动”。湖南省委因此下令停止出发，各回其乡。只有浏阳农军因未接到命